

徐立亭 著



「清帝列传」

咸丰帝 同治帝

皇帝

传

下册



吉林文史出版社

清 帝 列 传

咸丰·同治帝

(下)

徐立亭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咸丰·同治帝/徐立亭著.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皇帝丛书.清帝列传)

ISBN 7-80528-710-4

I.咸… II.徐… III.①咸丰帝(1831~1861)-传记 ②同治帝(1856~1874)-传记 IV.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120 号

咸丰·同治帝

作 者:徐立亭

责任编辑:吴 燕

封面设计:正典书装

出 版: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330 千字

印 张:16.75

版 次:199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528-710-4/K·286

定 价:36.80 元(上、下册)



第五章 同治“中兴”

祺祥政变后的晚清政局发生重大的转折。在政治舞台的上下前后,都发生新的变化。在“上面”,清廷中央权力发生再分配,国家体制由权出一人变成垂帘听政与亲王议政相结合的联合体制;在“下面”,以汉族官僚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成为同治“中兴”的中流砥柱。在“前面”,一批带有买办官僚色彩的新官僚构成“中兴”朝臣,控制了清政府的权力机构和实际部门。在“后面”,拥有先进技术与贪婪本性的外国侵略者千方百计地改造清政府,扶植代理人,操纵、影响着晚清政府的决策,开始成为幕后主宰者。

259

第一节 垂帘听政

一、太后垂帘养心殿

咸丰皇帝去世,留下一群年轻的寡妇。皇后钮祜禄氏只有二十五岁,皇贵妃叶赫那拉氏才二十六岁。她的儿子载淳即位后,并尊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与圣母皇太后。

咸丰十一年九月初一日(1861年10月4日),大学士桂良等遵谕旨上徽号,母后皇太后徽号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徽号为“慈禧皇太后”。^①奏折宣称:“慈为福本,共欣仁惠之

^①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98页。



滂流，安乃寿征、永卜康强之叶吉；绵慈晖于天上，化日方长，延禧祉于宫中，祥云普荫。”这当然是些谀美之词。（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9月22日），皇上正式上太后徽号。）

九月三十日（10月2日），内阁奉上谕，就皇太后垂帘听政等问题举行会议讨论。上谕中承认：“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惟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太后听政是必须执行的，没有讨论的余地，只须讨论程序问题。“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著一并会议具奏。”^①

这可是有清以来的新问题。王公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反复讨论。建立一套新的政治体制是艰难的，需要不断完善。

十月初五日（11月7日），内阁奉上谕宣布更新年号，改“祺祥”为“同治”。“同治”，意思是两太后至同治政。^② 初九日（11月11日）宣布明年为同治元年。

十月初七日（11月9日），内阁奉上谕公布了两宫皇太后听政，处理“各省及军营折报”和“紧要军务”的程序：“嗣后，各直省及各路军营折报应行降旨各件，于呈递两宫皇太后慈览，发交议政王、军机大臣后，该王、大臣等悉心详议，于当日召见时恭请谕旨，再行缮拟，于次日恭呈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阅定颁发；应行批答各件，该王、大臣查照旧章，敬谨缮拟呈递后，一并于次日发下；其紧要军务事件，仍于递到的立即办理，以昭慎重。”^③这是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重新分配中央政务的处理大权。太后掌握审核和裁决权。恭亲王取得“议政”和施政权。

①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02页。

②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5页。

③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19页。



稍后，翰林院侍讲学士杨秉璋、御史林寿图，条奏皇太后垂帘听政各事宜，提交廷臣会议，“公同详阅。”几经修改补充，逐步完善。最后，由礼亲王世铎领衔，将两宫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公同妥议条款，“敬缮清单恭呈御览，伏候钦定”。

列名会议的王公大臣整整一百人。上自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御前大臣、大学士，下至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监察御史，阵容之大，足以惊人。^①

十月二十六日（11月28日），两宫皇太后懿旨宣布垂帘，廷臣上垂帘章程。

关于垂帘听政章程拟定十一条，主要内容有三点：

第一，关于召见大臣的章程。“召见内外臣工，拟请两宫皇太后、皇上同御养心殿，皇太后前垂帘，于议政王、御前大臣内轮流派一人，将召见人员带领进见。”

第二，关于召见京外官员的章程。“京外官员引见，拟请两宫皇太后、皇上同御养心殿明殿，议政王、御前大臣带领御前，乾清门侍卫等照例排班站立。皇太后前垂帘设案，进各员名单一份，并将应拟谕旨分别注明。皇上前设案。带领之堂官照例进录头签，议政王、御前大臣捧进案上，引见如常仪。其如何简用，皇太后于单内钦定铃用御印交议政王、军机大臣传旨发下，该堂官照例述旨。”

第三，关于任免官员的章程。“除授大员，简放各项差使，拟请将应补应升应放各员开单，由议政王军机大臣于召见时呈递，恭候钦定，将除授简放之员铃印发下缮旨。”^②

①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34～137页。

② 《清穆宗实录》第8卷，第45～47页。



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地点在紫禁城的养心殿东暖阁。据《清宫述闻》记载：“养心殿在乾清门西，遵义门之内，召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及引见官员等，俱由乾清门进内。养心殿引见之日；带领引见之堂官至中正仁和殿，从左扉入，跪御座左傍，引见官至抱厦玉墀上，跪奏履历。召见军机大臣畴咨政事，面受制勅及各部院司寺京堂官，各旗员之轮直奏事者，蒙赐对时，咸得至西暖阁之勤政亲贤殿。”^①

两宫皇太后听政为什么要“垂帘”？

这是封建社会男女有别、内外有别的社会风尚造成的。据说，太后临朝，始于汉代高皇后。班固在《汉书》记载：“高皇后吕氏，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惠帝即位，尊吕后为太后。”“惠帝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大赦天下。”^②吕后临朝称制，《汉书》上没有提到“垂帘”二字，说明当时“男女有别”的风气还不够明显。到了晋朝，康帝皇后临朝时，就实行“垂帘”了。据《合璧事类》记载：“晋康帝崩，穆宗即位，时年二岁。皇太后设白纱屏于太极殿，抱帝临轩。”皇太后与大臣之间用“白纱屏”为界限。

《旧唐书》记载唐朝高宗时，“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皇后武则天先垂帘听政。“时帝风疹不能听政，政事皆决于天后。自诛上官仪（西台侍郎）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③

宋朝道学盛行，宣扬“男女有别，国之大节”。真宗的章献皇后，仁宗的光献皇后，英宗的宣仁皇后临朝，与群臣见面，都要“垂帘”御殿。此后，男女之间的界限则更为严格了，

① 章乃炜：《清宫述闻》第341页。

② 班固：《汉书》第3卷，第95页。

③ 《旧唐书》第5卷，第100页。



成为一道无形的高墙。

清代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于养心殿。据《翁文恭公日记》所载：“帘用纱屏八扇，黄色。同治帝在帘前御榻坐。”“王大臣于养心殿阶下摘帽碰头谢赏。”这是听政位置。

《圣德纪略》记载：“钦圣（慈禧）披览章疏，日以数百，某折某事，洞晰无遗，鸿机初入枢廷，一日因事谕曰：我十八岁入宫，文宗显皇帝在宫内办事时，必敬谨侍立，不敢旁窥，一无所晓。后来军务倥偬，折件极繁，文宗常令清检封事、略知分类。垂帘以来，阅历始多，至今犹时时加慎，惟恐用心不到。”^① 这是说太后严格。

又据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记载：“养心殿本前明遗址，雍正年间始加缮葺。殿作工字式，前后凡十二楹。中为穿堂，东西配殿十楹。前殿之东西暖阁，中界为重户曲室，或屏或壁，或纱厨，各悬榜以为别。”“养心殿西暖阁西门上，悬各省总督以下知府以上，将军以下总兵以上姓名单，西壁悬天下缺分繁简单，自乾隆间始。”^② 这是记录养心殿的结构与室内陈设。

清朝向无太后干涉行政的先例。在前几代的小皇帝还有两位。一是清世祖福临，即顺治皇帝，一是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皇帝。当年，清太宗皇太极在关外崩逝，世祖（福临）年甫六岁，由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世祖崩逝，圣祖八岁即位，由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捕政。“均未闻前之皇太后、后之太皇太后出而听政。”^③

为什么咸丰末年出现“太后垂帘听政”的政治局面呢？历史事件是复杂的多面体。既有一因多果，也有一果多因。

① 引自章乃炜：《清宫述闻》第5卷，第346页。

②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第17卷，第181～182页。

③ 恽宝惠：《关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因果》。



垂帘政局的产生原因种种：

第一个原因，是咸丰皇帝遗诏留下后患。“垂帘辅政兼而有之。”他防止皇权旁落，授太后阅折钤印权；防止皇权削弱，用辅政大臣相助。

第二个原因，是八大臣没有与太后很好的合作，矛盾发展到对立。如果双方都能克制自己，稳定大局，也有可能维持制衡局面。

第三个原因，是慈禧野心太大，不能容人。据说，“事实上，东后慈安虽早由皇贵妃正位中宫，然其秉性懦弱，遇事一无主见，朝廷遂听西后慈禧一人主张。”^①西太后既不了解下情，也无政治经验，凭借特殊地位硬要把持朝政。

第四个原因，是奕訢见机行事，利用矛盾，巧妙地与后党结合。他的力量与形势都不足以取而代之，只好是“后党”、“新党”联合专制。

太后听政后，为了寻找历史根据，令搜集典故。十月十五日（11月17日），谕内阁“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垂帘事迹汇纂进呈”，“至现在内外庶政，均赖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定，并承慈命，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前史垂帘事迹，著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等择其可为法戒者，据史直书，简明注释，汇为一册，恭呈慈览。”^②后来编成了一部书，叫做《治平宝鉴》。

十月二十九日（12月1日），正式宣布两宫皇太后十一月初一日（12月2日）垂帘听政，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应诣养心殿行礼。惟念惠亲王辈分最尊，且属内朝，与朝会大典有别，免除随班行礼。太后对其叔公予以照顾。从这天

① 恽宝惠：《关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因果》。

②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26页。



起,清朝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历史开幕了。

垂帘听政的大典是隆重而严肃;热烈而庄重。《穆宗实录》记载垂帘听政的大典经过:“十一月,乙酉朔。上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王以下大学士、六部九卿于养心门外行礼。”文武百官,盛会于此。

《翁文恭公日记》(十一月二十四日),记其随父翁心存入觐情形:“黎明侍大人入内,辰正引见于养心殿。两宫皇太后垂帘(用纱屏八扇,黄色),皇上在帘前御榻坐,恭邸立于左,醇邸立于右。吏部堂官递录头笏,恭邸接呈案上。是日引见才二刻许即出。”

曾国藩日记(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记载觐见经过:“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黄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以上可见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一般情景。

薛福成《庸盦笔记》记录了他对垂帘听政的评论:“当时,天下称东宫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时事咨访利弊,悉中窥会。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日不决一事。然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两宫皇太后各有所长,有所短。“西宫太后性警敏,锐于任事,太后悉以权让之,颓然若无所与者。后西宫亦感其意,凡事必咨而后行。”^①她们在处理国家大事的过程中,取长补短,互相合作。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似乎初期配合较好。历史的机遇,将两个女人结合在一起。

^① 薛福成:《庸盦笔记》第2卷,第25~26页。



二、恭王议政握重权

恭亲王奕訢在祺祥政变中出力最多,成功后取得的权力最大。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八日(1861年11月10日)内阁奉皇太后懿旨优礼嘉奖恭亲王奕訢:“著以亲王世袭罔替,实属论功行赏。”恭亲王拒不敢受,“辞谢倍力,声泪俱下。”两宫皇太后未忍重拂其意,不得已姑从所请,将世袭罔替亲王的懿旨暂时缓议。同时也留有余地,说等同治小皇帝“亲政之年,再行办理。”

亲王世袭罔替,自有清以来只有八个铁帽子王,都是清初的创业功臣。这个至重嘉奖,说明两宫太后对恭亲王的感激深情。接着,又宣布恭亲王奕訢“赏食亲王双俸”,“以示优礼。”^①他不好再拒绝,只好谢恩承受了。

三十岁的奕訢执掌着清王朝的实际权力。两宫皇太后名义上有最后裁决权,但在实际上要依赖恭亲王。因为太后“初次听政,可为太后试验之期,表面若无大权。”^②

恭亲王在当时不仅仅因为人多势众。在京师的官员几乎全部拥护他。在热河的官员中也有他的亲信。在地方官员中不少官员是倾向他的。除此以外,最主要原因是恭亲王的背后有了外国人做强有力的支柱。奕訢完全投入西方侵略者的怀抱,成为外国势力的代理人。

当时,外国侵略者看到清王朝的决策者远在热河,而且不能成为驯服的工具。他们认为只消朝廷不在北京,怡亲王、端华和肃顺继续掌政,我们就不能说中国人民已确实承

①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20~121页。

② 濮兰德等:《慈禧外记》,第37页。



受了条约。各省当局看到国家重臣,实际掌权的人是偏向不友好的,他们也就形成和我们为难的倾向。”^①

外国侵略者认为恭亲王奕訢“处事表现很开明的看法”,是极合适的代理人。如果“通过满清朝廷而指挥那种适合他们利益的政府。”^②奕訢是最佳人选。

然而,他们看到恭亲王奕訢虽然做为全权代表谈判,“可是皇上为另一批人所包围,那些已经闹出许多灾祸的奸臣们劝他留在现地。”^③

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甚至主张把奕訢扶植起来做皇帝。

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在给外交大臣罗素的信中,刘于恭亲王奕訢去热河奔丧,明确地表示支持:“恭亲王不顾阻挠他应召的各种阴谋终于到了热河。……他向太后保证,我们在此并无可怕之处,这方面他对太后回京负完全责任。为了顺从恭亲王的意思,并证明我们是准备帮他把皇帝从那群险恶党徒手里解救出来的,我和我的同僚们曾注意防止外国人冒犯皇帝一行入京的行列。”^④

外国侵略者对于北京政变的成功,表现更大热情。他们说:“已故皇帝的亲信逮捕斥责后,接着就有一道上谕,宣示太后听政,任恭亲王为首揆,桂良、文祥等人并有任命。总之,大家认为其表现最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这件文件把对外国人失信和歪曲我们意

① 《卜鲁斯致罗素》。引自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1952年第4期,第18页。

② 拉铁摩尔:《现代中国之创造》1945年伦敦版,第119页。

③ 《威妥玛致卜鲁斯》(1861年1月20日),转引自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1952年第4期。

④ 《卜鲁斯致罗素》(1861年11月12日),引自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1952年,第4期。



向致形成错误政策的事,看成如此有干国法的重大罪状,构成推翻并扫清被故君所信任而自命已由故君把政府大权付托给他们的那伙人的正当理由。这意见也就隐含着恭亲王及其同僚的操权,乃是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这个令人感觉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这充分证明我们坚持下列政策之正确。这就是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① 无论从希望到行动,都说明恭亲王奕訢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至深。“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倾心于并相信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②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北京政变不仅仅是清朝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在权力之争的同时,包含着更多内容的是政策之争。北京政变标志着外国侵略者对清政府改造的成功。这次政变之后,中外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外国对华政策产生大幅度的调整。清王朝的对外政策也发生十分明显的变化。由宫廷政变导致人事与政策的大变化,从而对近代历史进程产生较大的影响。

这是清王朝投降派对抵抗派的一次巨大胜利。北京政变使外国侵略者扶植的势力第一次取得了清政府的最高权力。这个权力无疑首先表现在恭亲王议政方面。

议政是清政权封建化初期的一种政治制度。在当时的

① 《历史教学》1952年第4期。

② 《普鲁斯致罗素函》(1861年11月12日)。见坂野正高:《中国和西方1858~1861》。



最高决策者是议政王大臣们。“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者,皆交议政大臣。每朝期,坐中左门外会议,如坐朝仪。”^①天命年间,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任命皇子八人俱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反映军事民主制度的遗风。清太宗皇太极继位以后,设八旗总管大臣各一人,与诸贝勒共同参预议国政。这就降低了议政王的权威地位,加强了皇权。雍正年间,清世宗胤禛设立军机处,取代了议政王大臣制度。乾隆年间,正式地取消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说明封建皇权更为高度地集中了。

恭亲王奕訢授为“议政王”,没有设立“议政处”,没有丝毫集体决策的民主意义。实际上,议政王的地位只是相当于军机处的首领而已。因此,奕訢等奏批发折报拟用“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字样。^② 尽管如些,议政王奕訢的权力在当时,仍然是举朝无双的。恭亲王奕訢的精明之处在于紧紧背靠两宫皇太后这两棵大树,这就比当年辅政的八大臣略胜一筹。在同年十月初八日,奕訢上奏《沥陈微忱请飭臣工于用人行政各抒所见折》,就是力图讨请“上方宝剑”,取得群众支持。他首先讲述大臣“集思广益”的重要,“窃惟自古大臣未有不开诚布公,集思广益,而可以任天下之事者也。臣以樗栎菲材,谊属天潢近胄,蒙皇上仰承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委以重任。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敢不尽心竭力,一秉公忠,与在廷诸臣认真办理,以期仰慰先帝在天之灵,用酬委畀深恩于万一。然任大责重,且当此中外多事之秋,深恐一时见识偶疏,致滋貽误。臣虽不敢引嫌自避,亦何敢居之不疑?再四思维,惟有吁恳天

① 昭槁:《嘯亭杂录》,第4卷。

②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07页。



恩,俯鉴臣受命祗惧之忱,明降谕旨,飭下中外大小臣工,嗣后于朝廷用行政贤否是非,务当各抒所见,据实胪陈,以求折衷于至当。”^①他强调为政要集思广益各抒己见,也表示自己要尽心竭力,不负重任。果然,两宫太后以皇帝名义发出上谕,内称:“恭亲王奕訢贤亲众著,朝野咸知。皇考大行皇帝在位,曾蒙特简赞理枢廷,深资倚畀。上年京畿弗靖,又复留驻京师,办理一切事务,均极妥协。我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谨循家法,授以议政王,并掌枢机,此实默体皇考燕翼贻谋。该亲王滋命益恭,其尽忠竭虑以保义我邦家,因为至谊,所不容辞,詎非天下臣民所同系望也!”对恭亲王的功劳予以充分肯定,重要地位也予承认。“当此国家多事之秋,王以懿亲而膺重寄,凡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自罔不竭尽心力,而我诸臣皆身受国恩,亦岂有不及时思效,奋其忠诚,以纾多难者乎?前经降旨诏求直言,兹特再行申谕中外大小臣工,嗣后于朝廷用行政各有所见,务当切实直陈,毋得稍存畏匿隐忍之见。我两宫皇太后方询切刍蕘,以求治理。即恭亲王奕訢正欲与诸臣精白一心,同襄郅治,亦得虚衷参酌,尽其多方延揽之诚。”^②上谕表明对恭亲王的议政是充分信任,完全放手的。

恭亲王奕訢又一个头衔是宗人府的宗令。宗人府是掌管皇族事务的机构。在封建宗法制度下,是以血缘远近关系区分家族亲疏的。宗人府的最高长官是宗令。“掌皇族之属籍,以时修辑玉牒,办昭穆序爵禄,均其惠养而布之教令。凡亲疏之属胥受治焉。”^③设立宗人府就是为了保证皇族许多优厚的待遇和特权,维持封建宗法统治。恭亲王奕訢执掌皇

①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21页。

②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21页。

③ 乾隆《大清会典》第1卷。



室的族长权。

总管内务府大臣是奕訢第三个头衔。内务府是管理宫廷事务的衙门,是清代直接服务于最高统治者皇帝及其家族的专门机构。内务府负责管理满洲上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包衣组织的全部军政事务和管理宫廷内部的人事、财务、礼仪、保卫、刑法、工程、制造、农林、牧副、渔猎以及日常生活的一切事务。总管内务府大臣是内务府最高首长,掌包衣政令和宫内事务。^① 其具体职责是办理宫内祭祀,朝贺礼仪,扈从后妃出入,总理皇子、公主家务,宫内筵宴设席,监视内阁用宝,宫内及圆明园值班,考察、任免、引见本府官员等。^② 这是一个有实际权力的职务,是宫廷里的当家人。恭亲王奕訢肩负着军事、行政、财务、皇族、宫廷各方面的重要权力,对于一个年轻贵族来说,可谓得天独厚,显赫一时了。这种诸权集于一身的情况,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也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在短暂时间内是可以维持,但为时不久则出了问题。因为在君权专制时代是不容许大权旁落的。皇帝虽小,皇太后要建树自己的权威。

三、立威连斩两大臣

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不久,就下令连续处斩总督何桂清和都统胜保两个大臣。引起朝廷内外极大的震动。是严法,是立威,还是狗烹?人们议论纷纭,莫衷一是。这当然要从当时形势说起。

^① 《光绪会典》第89卷:“包衣”是旗籍的名称,原是满洲话“家”的意思,“衣”是虚字的。清末入关前,凡所获各部落俘虏,都编为“包衣”,分居八旗。属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的,隶内务府,其他属各王府。

^② 李鹏军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论》第2章。



辛酉政变后的形势依然是严峻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接连不断，从外部冲击着清朝政权。各地官吏腐败无能，贪庸骄蹇，统兵将帅，拥兵自重，畏缩不前，假冒战功，欺蒙朝廷。封疆守将，擅离任所，贻误事机。官场的混乱直接从内部腐蚀清王朝的统治基石。“就其最著者言，汉人中莫若何桂清，满人中莫若胜保。”^① 这是文武大臣中的两个典型。

何桂清，字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编修，五迁至内阁学士。咸丰四年，由江苏学政授浙江巡抚。咸丰七年二月，会两江总督怡良解职，经大学士彭蕴章荐举，皇帝命何桂清。“以二品顶戴署理两江总督，即赴新任”^②。六月，实授两江总督。八年十一月受命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通商事务。十年正月，赏加太子太保衔。他居功自傲起来，“桂清意气发抒，倚畀益重，甚负时望，与胡林翼齐名，天下皆称何胡南宫保。”^③

同年闰三月十五日(5月6日)，太平军打垮江南大营。何桂清驻扎常州，坐视不救。太平军攻常州，何桂清企图弃城而逃。江苏按察使查文经、江苏布政使薛焕、江苏盐巡道英祿、江安粮道王朝纶等联衔稟请退守苏州，“显系见事危急，意在同逃。”^④ 何桂清决定放弃常州，先将父亲和两妾密送苏州，后发告示禁止居民迁徙。常州绅民耆老数百人执香烛跪请何桂清留守，阻塞道路。何桂清下令开洋枪纵击，死者十九人。何桂清逃到常熟，自请议处。咸丰皇帝下令将何桂清革职候审。由于庚申之变，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又病死

① 肖一山：《清代通史》(三)，第452页。

② 《清史列传》第49卷，第3856页。

③ 肖一山：《清代通史》(三)，第452页。

④ 《清史列传》，第49卷，第3859页。